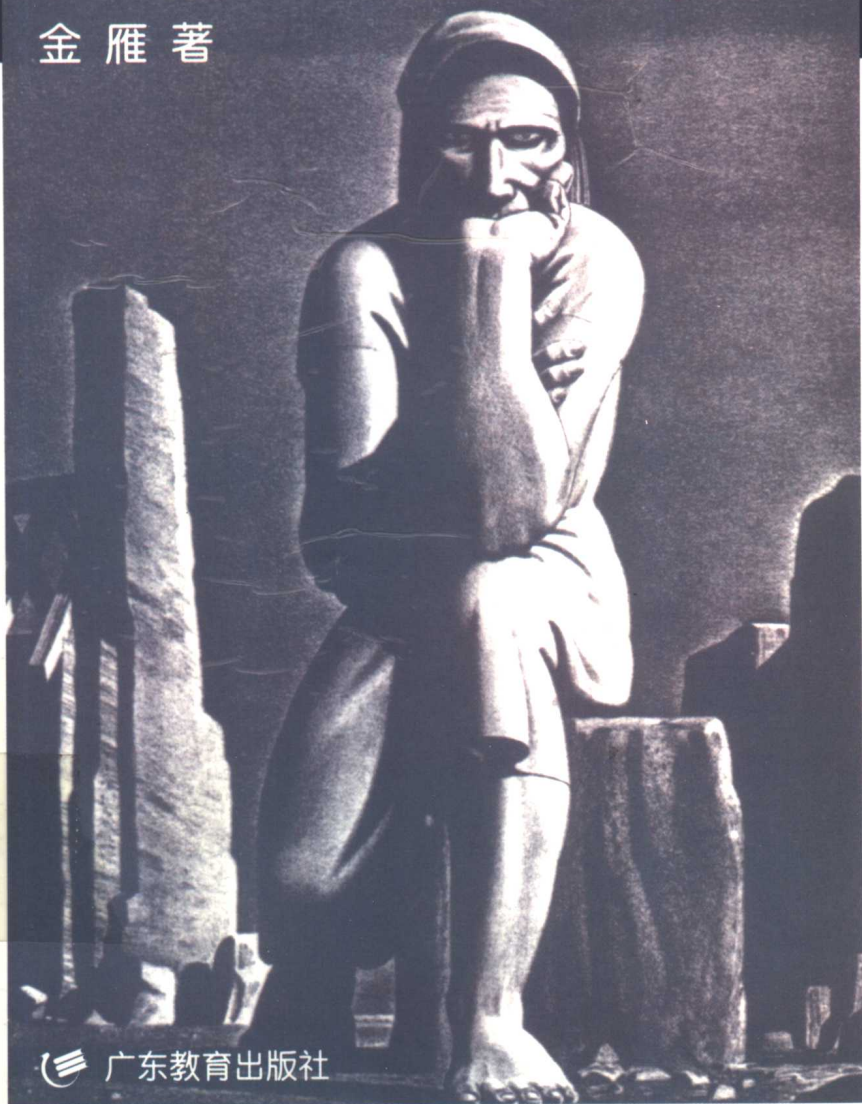


荒原学术文丛一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金雁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K512.5
J820
22

荒原学术文丛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金雁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037553
755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金雁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1

(荒原学术文丛)

ISBN 7-5406-4008-1

I. 俄…

II. 金…

III. 苏俄—现代化改革与研究

IV. K512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市桂城叠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217000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406-4008-1/K·23

定价 13.2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致 读 者

——《荒原学术文丛》序

这里没有水，只有岩石
只有岩石，没有水，一条砂路
蜿蜒而上，绕进群山

.....

——艾略特：《荒原》

千沟万壑，白骨残垣，
诉说百年荒诞，千年坎坷。
岩巉苔滑路难行，
可有飞登捷径？
不屑随风上云端，
无意攀高附势。
冷眼睥睨，凿石斩棘，
险地放歌，谷底行吟，
别有豪情韵味。
鸦噪犬咬助兴，
荒原约会，
相顾一笑，
自由之最是心声。

袁伟时

1998年7月15日

F141/31.3

目 录

自序	(1)
----------	-----

“富农问题”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苏联“富农”为“资产阶级”说质疑

——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经济”的性质与历史地位 ..	(7)
农村阶级分析方法的源流与“富农”成分划定标准 ..	(7)
集体化前“富农”的经济地位与阶级属性	(14)
农村“分化”的性质与允许“富农经济”发展的政策	(24)

20年代苏联关于“农村分化”问题的统计学研究

农村分化统计研究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36)
“动态研究”学派与“预算研究”学派	(41)
涅姆钦诺夫的统计学成就	(48)

苏联1927~1928年度的粮食危机

“供”的太少还是“求”的太多	(58)
粮食危机与“富农”问题	(70)
粮食危机与商品荒	(76)
粮食危机与价格政策	(79)

苏联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问题

1928~1929年间对富农的政策	(87)
富农经济的“自行消灭”	(92)
富农标准的下降与“富农”队伍的扩大	(98)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苏联集体化时期的

“消灭富农”运动	(106)
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到“贡税论”	(106)
“消灭富农”与全盘集体化	(115)
“消灭富农”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	(127)

苏俄历史观之重构

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137)
俄罗斯的村社文化传统	(138)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141)
“西学东渐”与村社制度的复兴	(145)
在文化冲突中重构苏联史	(150)
19 世纪俄国的“离土不离乡”：身份性农民的非农化浪潮	(156)
“公社世界”的危机与身份壁垒	(156)
农民等级中的“边缘人”	(161)
身份制的废除与“离土不离乡”的消失	(168)
从奇吉林到鲁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近代史的“怪圈”	(172)
奇吉林事件：向束缚者企求保护的农民	(173)
鲁多尔瓦伊事件：更强大的“保护”与更严酷的束缚	(179)
鲁多尔瓦伊之后：极端的“保护”与极端的束缚	(182)
民粹主义：俄国与世界，昨天与今天	(185)
民粹主义的幽灵在世界徘徊	(185)
历史上的“革命民粹主义”与“警察民粹主义”	(188)
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195)

转型危机中的精英与大众

斯托雷平改革与村社复兴运动	(207)
“分家”：瓦解“公社世界”	(208)
改革的原则与特点	(213)
改革的成果与影响	(218)
改革走向反动	(223)
“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	(231)
冲破公社世界，呼唤市场与宪政	(232)
1905 年风波：自由主义反对派与政府开明派的双输之局 ...	(234)
“反动时期”的“彻底改革”与自由主义的大尴尬	(235)
“路标”改变之后：俄国社会运动的“缺席”者	(239)
“保守化”的精英与“激进化”的大众	(244)
“雪崩”、“人民专制”与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末日	(248)
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 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253)
传统俄罗斯：三位一体的“公社世界”	(255)
政治专制下的经济改革：“斯托雷平奇迹”的甜头与苦果	(260)
“公社世界”的复兴：“反传统”还是“超传统” ...	(267)
1917 年革命还是“十月革命”	(272)
政治风云与苏联地名学	(279)
俄国地名政治性更改的传统	(279)
第一次地名更改风潮	(283)
第二次地名更改风潮	(287)
第三次地名更改风潮	(291)
第四次地名更改风潮	(300)
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305)

自序

本书所收 13 篇文章，并未按常例以所述史事的时间顺序排列。但我认为读者对此不难理解：这不仅是我研究苏俄历史的思路进程，也是通常人们面对一个认识对象的思维路径：人们先是急于知道“它是什么”，继而在感触之余，便要追问“它从何而来”，“向何处去”，而在对其来龙与去脉有所了解之后，就不仅会对“它是什么”的理解更进了一步，而且在这一“我思故我在”的心路中也就更能理解“我是什么”，更能把握我们自己的存在及意义了。这也正是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的目的所在。

自 1978 年成为“文革”后首届苏联史专业研究生起，我治苏联东欧史已历时 20 年。“新经济政策与俄国农民”是我进入的第一个领域。这不仅因为当时我国农村改革刚启动，农民问题已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首先突破的方向，而且也因为农业是苏联体制弊病最突出的领域。在“集体化—消灭富农”、政治清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误”，这 60 年代以来人们就耳熟能详的斯大林时代“三大阴影”中，前者无疑是最能反映该体制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性质、最能超越“事件性”、最深地触及社会底层和民族文化深层，而又具有长时段特征的现象。在当时（1983 年前后）为集体化前这些成功的家庭农场与农户（所谓“富农”）作整体性辩护，从性质上否定“消灭富农”运动（而不是仅仅指出其“过火”或“扩大化”），这

不仅在我国而且在那时苏联东欧国家的史学界都是第一次。为此不能不作大量的考证工作，这不仅涉及农村经济本身，而且涉及苏联社会分层理论及其统计学基础的来龙去脉，涉及苏联的粮食体制、原始积累机制及相关的工业化论争等。因此这篇文章篇幅都较长。由于涉及当时的敏感领域与前沿话题，论证不充分，不敢迈出这一步（当然编辑也不会用），而论证充分了，篇幅过长又造成刊载的困难。虽有师友同仁的支持而多得以及时问世，但一些文章还是不得不压缩内容，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一文当时则未能发表。但是，也正因为做了充分的工作，在有关苏联模式真相的大量资料与研究滚滚而来的今天，这些当年的作品也并未过时。

俄国在传统上是个农民之国（但未必如以前所云是“小农”之国）。正如С. Ю. 维特所说：“俄国社会的整个中坚，俄罗斯大地的全部未来，俄国现在与未来的全部历史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是同农民的利益、生活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在“富农”问题上反映的俄国农民的命运，也可以看成是苏联历史的一个缩影。到了80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了新的改革气候，批判旧体制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但那时我已感到时代要求我们最关键的已不是单纯的“批判”，而是探讨这样的体制因何而生，从何而来，它又将向何处去。这使我把目光向“苏联模式”的前、后延伸。

在批判“全盘集体化”时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集体化前的新经济政策理想化，正如批判斯大林时，人们往往把布哈林塑造成新的先知、反思俄国革命的“新保守主义者”，往往把革命前的沙俄看成黄金时代一样。在我们这里不也有为了否定“文革”而盛称“50年代黄金时代”的现象吗？然而历史总是连续的，苏联模式也有其传统之根。渲染集体化前的“富农—资

产阶级”危险，固然是“左”的表现，但这不意味着那时没有比“资产阶级”更负面的东西。我从1986年开始研究俄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村公社，并在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发表了《农村公社与十月革命》，由此开始了对苏俄史逻辑体系的重新思考。与社会上的村社传统相应的是思想史上的民粹主义传统，自1986年起我受欧美“恰亚诺夫热”的启发，从当时在苏联尚未平反且几被“遗忘”了的恰亚诺夫等“新民粹派”入手，重新认识民粹主义。而苏联本国学界对恰亚诺夫等人的重新认识，则是在1988年恰氏等平反后才热起来的。当时国际上对俄苏思想的研究，“体制内”注重布哈林等非斯大林派思想家，“体制外”则注重东正教背景的“俄罗斯思想”。但我觉得，世俗的俄罗斯思想，尤其是村社土壤上生长的民粹主义对俄（苏）历史的发展影响更大。在这方面因文章较多，我已另辑为《人民之子与人民之父：从民粹派到布哈林的传统》一书，本书收集的仍以社会史传统（村社传统）为主线。实际上，社会史传统与思想史传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把二者结合起来仍是我今后的治学方向。

进入90年代后，国外有苏、东剧变，国内在特定的气氛下出现了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争。我的研究也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以前研究俄国传统及苏联体制“从何而来”的基础上加深了对1917年以前俄国社会转型期危机的探讨，尤其对斯托雷平改革与1917年革命之间俄国的政治—社会演进及大众（主要是农民）与精英（主要是政府与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予以关注。无庸讳言，这里有“有感而发”的冲动，但并非轻率的即兴之作，本书将“立此存照”；如果历史证明我的忧患是多余的，那将是最令人高兴的事。

本时期我的另一研究方向当然是苏式体制“向何处去”的

问题，即剧变后苏东国家的转轨进程。与此有关的许多心得已辑入我的《新饿乡纪程》一书中，本书只收集了与苏联政治进程有关的一篇。但转轨进程既远未结束，我们的研究也来日方长，相信以后会有新的心得与读者交流。

总之，我信奉“有感而发，有据而论”的研究宗旨。有感而发，即文载道义，不作无病之吟；有据而论，即据实而书，不搞影射史学。我觉得对于高谈义理的空疏之学与专事章句的短钉之学都十分“繁荣”的当下而言，以上述宗旨自警是很必要的。能做到多少，就要听凭公论了。

感谢学界前辈袁伟时教授，我们至今未见过面，但他一直关心我的工作，没有他的热心鼓励与一再督促，就不会有如今这个集子。感谢广东教育出版社的金炳亮副社长与责任编辑为本书付出的心血。对于书中的浅薄粗陋之处，我除惶恐抱愧之外，也希望得到各方的指教。

金 雁

1998年4月于京西万寿寺寓所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富农问题』与

全盘集体化就是要把农民编制起来提供“原始积累”。显然，它与农村中是否发生了贫富差异并没有什么关系，更与农村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毫不相干。哪怕当时的小农是“一拨齐”地全无差别，只要国家需要“原始积累”，他们就必须被编制成集体农庄，而为了压制他们的反抗，并为集体农庄本身提供积累，“消灭富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富农”作为一种经济类型已经“自行消灭”以后还会有如此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

苏联“富农”为“资产阶级”说质疑

——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经济”的性质与历史地位

农村阶级分析方法的源流与 “富农”成分划定标准

研究农业集体化以前富农问题的关键之一，就是这里所说的“富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范畴？其社会经济地位究竟如何？

今天被汉译为“富农”的俄语词 *KYJIAK* 之原意为“拳头”，由握拳而引申出“抠门”、“吝啬鬼”、“守财奴”、“小商贩”等含义，其语感颇似于今天我们说的“大腕”之类，原本只是一句俚俗的骂人语，既无“富”、更无“农”的词义。19世纪时该词逐渐用以称那些并无高贵身份而靠“不择手段”暴发起来的人——他们未必在农村。因而这时的文献译成汉语就会出现诸如“乡村与城市的富农阶级”^① 这样的句子。而当时若要把城里的暴发户除外的话，就需说明“这里是专门谈农业中的富农”^②。但是，生活在最下层的农民们无疑对他们的同类中出现这样的暴发户最为敏感，因此这一名词用于农村的频率逐渐增

① 《俄国民粹派文选》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7页。

② 同上，第353页。

加。这使得 19 世纪 70~80 年代的民粹主义者第一次把 КУЛЯК 定义为“年轻的农村资产阶级”^①。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这一用法。这样,这一传统名词就被赋予了严格的定义,即专指资本主义大农或农场主,即使用雇佣劳动从事商品生产以榨取剩余价值的农业资本家。因此在苏联,富农往往又被称为“农村企业家”。^②但具体地看,苏联当时所谓的“富农”,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人们常提及的划分农村社会集团的标准(占有土地的数量、出租农具的数量,必须付出的劳动量、农业收入、贮备粮、牲畜、家畜等)并不清楚。”^③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当时的“富农”成了“没有社会学固定标准的社会形象。”^④关于“富农”的一些“远非学术性而且弹性很大的定义”也往往被抛在一边,“‘富农’一词,如苏联官员经常十分坦率承认的,并不是用来指一种经济地位,甚至也不是指一个社会阶级,而是指一种心理状态。”^⑤英国学者卡尔指出,在当时的苏联,常常“不是阶级分析决定政策,而是政策决定什么样的阶级分析方式适合特定的形势”。^⑥美国学者科恩也认为,当时农村阶级“划分的类别含糊不清”,“富农”的概念“与其说是一个严格的社会学上的分类,倒不如说是一个表示蔑视的词罢了”。^⑦这些言论固然不无偏颇之处,但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即 20 年代的苏联在分析农村阶级方面缺乏科学的方法

① 《俄国民粹派文选》中译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75 页。

② 在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居民赋税研究小组报告《苏联的税收负担》(莫斯科,1929 年)等书的有关栏目中,都以这个名称代表富农。

③ 弗朗科·巴蒂斯特拉达《布哈林和 20 年代新民粹主义》,载《布哈林问题论文资料汇编》(下册),1932 年,第 444 页。

④ 同上。

⑤ 姆·科·杰瓦诺夫斯基《苏俄史》下册,伦敦,1975 年,第 294 页。

⑥ 卡尔《一国社会主义》,麦克米伦公司,1968 年,第 47 页。

⑦ 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和通向社会主义之路》,载《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译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15 页。

与统一的标准,而且所用统计材料可靠性低,彼此矛盾,且常依政治形势而变化。这种现象不能完全归之于当局的实用主义。它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最初所面临的主要是城市资本主义关系中的阶级对立,《共产党宣言》曾指出:资本主义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直接对立的两大阶级。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农村中情况则复杂得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除了指出封建时代领主(封建主)与农奴(农民)的对立外,并未解决农村中其他形式的阶级、阶层分析问题。到19世纪末,由于资本主义关系中各种矛盾的激化,各种小资产阶级—农民政治流派的日益活跃,“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提出了农民问题”。^①在这种形势下,恩格斯写出了他晚年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法德农民问题》,首次把西欧农民根据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分成农业无产阶级、小农、中农与大农等阶级。列宁亲自把这部著作译成俄文,并发展了恩格斯所阐述的科学方法。在其不朽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运用大量地方统计资料,第一次对当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化进行了科学分析,并从耕地、牲畜、土地租佃、雇佣关系、收支状况等不同角度对农村各阶级经济状况进行了论证,但他并没有为各阶级确定明确的划分标准。因为在中世纪色彩还很浓厚的19世纪末的俄国农村,进行这项工作有许多困难,同时对于当时尚未展开农村工作的社会民主工党来说,也没有成为现实需要。因此列宁在最后综合各地统计资料勾画农村分化的全貌时,只是粗略地按一般经济状况把农民根据20%、30%、50%的算术比例划分为“上等户”、“中等户”与“下等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卷,第295页。

十月革命后，如何把恩格斯、列宁所倡导的农村阶级分析方法从经济学领域引入社会学领域，以解决农村现实中阶级划分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一个科学性很强的任务，但当时主要由于联共（布）党内斗争激烈，影响了理论探讨的正常进行，这个任务并未完成。因此，当时农村阶级的划分标准是十分混乱的，党也从未对如此重要的问题有过明确的规定。党的十五大注意到当时“在划分富农的具体工作中的困难”，并就这个问题进行过学术性讨论，^①但尚未取得肯定的成果便进入了“非常措施”时期。尤其是在富农的划分问题上分歧极大，对富农户比例的估计从0%到14%不等，甚至在同一本书中也是前后矛盾。^②当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与其他左倾分子都使用高的数字。例如：1925年反对派在列宁格勒出版了两本书，声称当时富农已占8%~12%，而革命前不过5%，贫农已占75%，而革命前是60%。^③加米涅夫更认为当时富农比例已达14%。^④而另一方面，维·鲍古谢夫斯基则在1925年发表《论农村的富农或传统在名词中的作用》一文，认为十月革命前的那种富农——“可恨的农村剥削者”，已经不复存在了。^⑤很明显，“富农”的概念模糊，是导致苏联党在富农问题上的一系列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先后实行的富农标准有以下几种：

余粮收集制时期，许多地方都以余粮的多少作为划分富农的标志，而其中有粮不交者则为“人民的敌人”。为了提供一个统一标准，1918年人民委员会规定“富农”是具有下列特征之

① 《布哈林问题论文资料汇编》，下册，第444页。

② 如波梁斯基的《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三联书店，1964年）一书中，关于1925年富农比例的数字，在第511页是6.9%，到563页又变成了3.2%。

③ 参阅《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1页。

④ 波波夫《苏共历史大纲》，莫斯科，1928年。

⑤ 《布尔什维克》，1925年第9~10期，第63~64页。